

《箕雅》研究

赵季 刘畅 (韩)金真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464088

教育部 2009 年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9YJA751047)
天津市 2008 年度社科规划项目资助 (TJZW08-033)

九江学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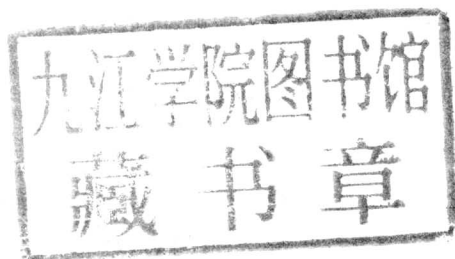
1455717

《箕 雅》 研 究

赵季 刘畅 (韩)金真 著



I 312.072
24816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8804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箕雅》研究 / 赵季, 刘畅, (韩) 金真著. 一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310-03580-9

I. ①箕… II. ①赵…②刘…③金… III. ①古典诗
歌—文学研究—朝鲜 IV. ①I3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87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 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 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 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228 千字

定价: 2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 23507125

弁 言

《箕雅》是朝鲜王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部韩国汉诗总集。其中收录自新罗诗人崔致远（857—？）至朝鲜肃宗时代诗人金锡胄（1634—1684）800年间共计490余位诗人的2253首诗作，几乎囊括了韩国全部优秀汉诗作品，向以规模宏大而采择全面著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国汉诗发生、发展和兴盛的全部过程，同时也是东亚汉文学极为重要的诗歌总集。但该书自1688年刊行后，340年间无人注解，对于该书的系统研究亦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7世纪后半叶，满清入主中国并成为朝鲜宗主国，朝鲜王朝对此不满，不像明代那样热衷汉诗研究。二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叶日本势力控制朝鲜半岛，大力推行日文。三是20世纪后半叶朝鲜和韩国相继废除汉字，失去了研究韩国汉文学的文字基础。

当今中国经济繁荣，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影响日益巨大。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也逐步开展和深入。笔者在2005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韩国诗话注本《诗话丛林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箕雅〉校注》（上、下册，中华书局），并同时完成了《〈箕雅〉诗人本事辑考》（已列入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即出）。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本书。本书试图通过对于《箕雅》所录诗歌以及诗人自身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朝鲜时期文学文化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思想文化内核，为中韩古代以汉字文化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近缘现象提供又一学术研究佐证。

本书由以下六部分组成：笔者撰写的《〈箕雅〉引经考》、《〈箕雅〉里的中国诗歌因子》、《〈箕雅〉诗人本事辑考三则》，以及笔者指导学

生刘畅完成的《〈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箕雅〉诗人室名别号溯源》，指导学生金真（韩）完成的《〈箕雅〉地理考》。笔者的前两种研究分别分析了《箕雅》收录的诗歌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以及诗歌的引用状况，归纳了其引用的主要形式，并进一步探究出其制度背景、私学教育、社会好尚与理学昌明、诗人主观因素诸方面的深层原因。《〈箕雅〉诗人本事辑考三则》选择朝鲜王朝诗歌成就较高、诗歌特色显著的三位诗人，从正史、杂史、碑志、序跋、笔记、诗话中蒐集有关他们的多方面资料，最后加以简明概括。《〈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箕雅〉诗人室名别号溯源》是南开大学第十一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项目，分别对韩国汉诗诗人名字及室名别号的汉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入发掘。而《〈箕雅〉地理考》则考证了《箕雅》一书涉及的名胜古迹、山河湖海今地所在，并用翔实的游记资料再现了它们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风貌。

不当之处，望中韩研究专家予以指正。

赵 季

2010年2月于南开大学范孙楼206室

目 录

弁言.....	1
《箕雅》引经考.....	1
《箕雅》里的中国诗歌因子.....	12
《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	26
《箕雅》诗人室名别号溯源.....	62
《箕雅》地理考.....	104
《箕雅》诗人本事辑考三则.....	231

《箕雅》引经考

《箕雅》是韩国汉诗规模最大的总集^①，可以视为韩国汉诗的代表性诗集之一。笔者在完成《箕雅校注》一书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即韩国汉诗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韩国汉诗是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的汉文学是韩国人作家以韩国人的生活为内容，以韩国读者为对象而创作的”^②，“这类文学作品形式上是用汉文表述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其表达韩国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比用韩国文创作者更为淋漓尽致，故此，它们被称为汉文文学”^③。而中国古代文化因子却在韩国汉诗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经笔者统计，在《箕雅》的2253首诗歌中，引《诗经》147处、《尚书》91处、《周易》37处、《周礼》22处、《仪礼》3处、《礼记》36处、《春秋左传》59处、《穀梁传》1处、《公羊传》1处、《论语》76处、《孟子》33处、《尔雅》14处、《孝经》3处，合计523处。如此之高的引用频率，反映了中韩友好交往与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以下就《箕雅》诗歌引用中国经籍的现象加以考察。

《箕雅》引经的几种形式

综观其引用形式，大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着重经籍中所反映的伦理精神。“半世功名敢自期，只今

①（朝鲜王朝）南龙翼编《箕雅》，韩国首尔大学图书馆藏本。

②（韩）赵东一等著，周彪等译《韩国文学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

③（韩）赵润济著，张瑰珪译《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3页。

还愧《伐檀》诗。”（南孝温《题圣居山》^①）本《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传：“素，空也。”陈奂传疏：“今俗以徒食为白餐。餐，犹食也。赵岐注《孟子·尽心篇》云：‘无功而食，谓之素餐。’”诗人在这里强调居官要龟勉国事民生，体现了儒家忠君抚民的传统思想。

“华屋沉沉更未归，棣花零落鹡鸰飞。余生不向江都路，忍看城南一片衣。”（金尚宪《梦到清风溪次韵》）本《诗经·小雅·常棣之华》：“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朱熹集传：“常棣，棣也。鄂，其承华者也。未有华盛于上，而鄂不韡韡者也。兄弟之相为益，亦犹是矣。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为小人好以亲为怨，而乐从其疏也。故此诗每陈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同诗“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朱熹注：“脊令，雍渠也。飞则鸣，行则摇。不能自舍。人之急难，相救不舍斯须如脊令者，唯兄弟也。虽有良朋，其甚者不过为之长叹息而已。况，甚也。”儒家精神中有兄宽弟悌传统，是农业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诗人梦见自己的兄弟，感怀思念，通过引用常棣表达了一片深厚的手足之情。

“勤俭书之训，盈谦易所详。愿言崇今德，终始似汾阳。”（卞季良《呈郑三峰十韵》）本《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周易·谦·彖辞》：“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勤俭谦逊乃中国儒家崇尚的重要美德之一，卞季良以此劝勉官高位重的郑道传（号三峰），其意义深焉。

最为典型的是《箕雅》中多次引用的“乘桴”和“浴沂”二典，分别出自《论语·公冶长》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论语·先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儒家本来是充满着经邦济世的积极情怀，但是封建专制制度在体制上不能保证儒家伦理正义的必然实现，所以孔子有

^① 本文所引韩国汉诗均出自《箕雅》。

“乘桴”的感叹，而且赞赏曾皙那种诗意化了的“穷则独善其身”的洒脱境界。同样，韩国诗人大都是国家官员，孔子所遭遇的儒家式困境也是他们必然遇到的。所以，他们屡屡以“浴沂”和“乘桴”来表达自己内心复杂微妙的心境，也就是必然的了。

“正是浴沂好时节，旧游魂断白云乡。”（崔致远《暮春即事》）
 “道泰辞桴海，春喧趁浴沂。”（郑梦周《贺李秀才登第还乡三十韵》）
 “春梦正应真趣在，浴沂吾兴咏归风。”（朴元亨《无尽亭次崔宁城韵六韵》）
 “谁知浴沂节，和病试春衣。”（郑士龙《释闷纵笔》）
 “春服已成今未御，花枝犹早几时看？”（李洪男《小寒食用杜韵》）
 “多少朋游俱兴逸，依然风咏舞雩行。”（黄廷或《一眉岛》）
 “乘桴踏海还追古，老泪无端忽满裾。”（朴祥《法圣浦》）
 “扁舟烟月思浮海，羸马关河倦问津。”（崔匡裕《长安春日有感》）
 “乘桴潜圣叹，终不陋蛮居。”（金净《积水》）
 “行藏未可谋，圣哲欲乘桴。”（朴闾《泛兴阳浦晚登永保亭纵饮》）
 “压海闻开槛，乘桴欲问津。”（金麟厚《寄题海亭》）

二是以经籍中的人物或事例比拟韩国现实。

“矢诗陈吉甫，聊欲颂周宣。”（姜希孟《向关东行在次韵》）本《诗经·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毛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史载：“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诗人在此以周宣王臣尹吉甫歌颂宣王，比拟自己对朝鲜国王的歌颂赞美，也体现了中国上古以颂赞诗鼓励君王实行清明政治的传统。

“皎皎在空谷，白驹歌正悲。无媒逢圣主，失意恋明时。”（任鍊《赠姜睡隐》）事本《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毛序：“《白驹》，大夫刺宣王也。”郑笺：“刺其不能留贤也。”任鍊在这里以周宣王不能挽留贤人比拟朝鲜宣祖不能任用姜沆（号睡隐）。

三是写实。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亦是主流思想，中国的经籍在韩国亦是国家经典，君臣上下都在学习运用。《箕雅》中的有些诗篇就

反映了这一事实。

“入夜银床露压烟，漏声初上紫微天。君王此际忧民切，案上时看《七月》篇。”（李晔光《宫词》）《诗经·豳风·七月》是农事诗，《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十六引王安石曰：“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飧也节，此《七月》之义也。”在农业社会中，凡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君主都会研习《七月》，本诗正是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事实。“护军虽散亦王官，内赐《豳风》再拜看。白发老臣心耿耿，隔墙邻女夜春寒。”（林亿龄《次井邑东轩韵》）林亿龄曾任中央军五卫属下正四品武官护军一职，当时朝鲜国王不仅自己研习《诗经·豳风·七月》，还下发给各级官员学习，此亦写实，可见朝鲜王朝时代中国经籍在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

“谈《诗》遗训诂，玩《易》贯精微。”（郑梦周《贺李秀才登第还乡三十韵》）真实再现了韩国文人儒士竭力追求《诗经》、《周易》精深微妙之旨，而不斤斤于章句训诂之细枝末节的那种得鱼忘筌的境界。

四是以经书语入诗。由于韩国诗人熟稔中国经籍，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叙事状物，还是议论抒怀，往往能够将经书语句信手拈来，贴切自如，文采斐然。状物如：“夭桃灼灼映疏篱，三色如何共一枝。恰似美人梳洗后，半妆红粉未均时。”（权伋《白沙宅应呼咏三色桃》）本《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叙事如：

“客卧是谁家，梦惊天一涯。邻鸡鸣不已，山雨夜如何。”（申光汉《夜宿村舍》）三句本《诗经·郑风·风雨》“鸡鸣不已”句。四句本《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句。议论如：“精一传心继执中，自将知遇动昭融。商家未霈思贤雨，舜殿才熏解愠风。”（申光汉《仁庙挽词》）执中本《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昭融本《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思贤雨本《尚书·说命上》：“（傅）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

心。’”解愠风事本《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疏：“郑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抒怀如：“倏然百年半，苍黄东海隅。吾生元局蹐，世路亦崎岖。”（李穡《遣怀》）本《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毛传：“局，曲也。蹐，累足也。”朱熹《集传》：“言遭世之乱，天虽高而不敢不局，地虽厚而不敢不蹐。”

更有甚者，如鱼变甲《临禪梦中作》一律，八句中竟用经书六处。“酸梨小洞古山阿，庐墓三年一掷梭。饘粥未厌疏食进，衰麻才着练冠加。昊天罔极思难报，中月而行禫已过。莫谓泉扃终寂寞，五男俱在子孙多。”“三年”指服父母丧第二十七个月所行除丧服之禫祭。本《仪礼·士虞礼》：“中月而禫。”郑玄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饘粥事本《礼记·檀弓上》：“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疏食事本《礼记·间传》：“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干肉。”衰麻事本《礼记·乐记》：“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练冠即厚缁或粗布之冠，古礼亲丧一周年祭礼时加练冠，本《礼记·丧服四制》：“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昊天罔极本《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箕雅》引经的原因

《箕雅》大量引用中国经籍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分析。

首先看其制度背景。

韩半岛自新罗以来就实施亲唐政策，新罗统一三韩后，偃武修文，急速输入唐文化，大兴儒学，其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自神文王二年（682）设立国学，“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

左氏传》、《文选》”。（《三国史记·职官上》）元圣王四年（788）订立读书三品制度。“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三国史记·元圣王》）二是实行留学生派遣制度。“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义之邦。”（《三国史记·敬顺王》）“二年……唐文宗敕鸿胪寺放还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共一百五人。”（《三国史记·文圣王》）“九年……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三国史记·景文王》）三是派遣使臣，输入经学资料。“六年……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三国史记·神文王》）

高丽、朝鲜两朝有关经学教育的制度则有科举、官学、经筵。

科举方面，高丽光宗时代九年（957），听取中国后周双冀的建议，建立了以考试经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如进士科初场考经义；明经科考《尚书》、《周易》、《毛诗》贴经及《春秋》、《礼记》读经破文义理；其他杂科中之三礼业考《礼记》、《周礼》、《仪礼》，三传业考《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何论业考《何晏论语》、《曲礼》、《孝经》等。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更加成熟，对士子读经的各种情况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五经》、《四书》成为士子们必须精通的基本典籍。

文科初试取二百四十人：初场，《五经》、《四书》疑义或问中二篇。中场，赋颂铭记中一篇，表笺中一篇。终场，对策一篇。

明经试《四书》、《五经》。馆（成均馆）、汉城乡试则上项“九书”通、略以上者取之；复试则“九书”中七通二略者取之；殿试则制术等三十三人内取之。

讲书：通，二分；略，一分；粗，半分。句读训释皆不差误，

讲论虽未通，不失一章大旨者为粗；句读训释皆分明，虽通大旨，未至融贯者为略；句读训释皆精熟融贯，旨趣辨说无疑者为通。

文科复试取三十三人：中场、终场同初试，初场讲书《四书》、三经（愿讲余二经及子、史者听。）（《经国大典》卷三《礼典》）

太祖元年（1392）宣布：“今后内而成均正录所，外而各道按廉使，择其在学经明行修者，开具年贯三代及所通经书，登于成均馆长贰所试讲。所通经书，自《四书》、《五经》、《通鉴》已上通者，以其所通经多少、见理精粗，第其高下为第一场。入格者送于礼曹，试表章古赋，为中场。试策问为终场。通三场，相考入格者三十三人，送于吏曹量才擢用。”（《朝鲜太祖实录》卷一）

官学方面，高丽睿宗四年（1109）设立国学七斋。

四年七月，国学置七斋：《周易》曰“丽泽”；《尚书》曰“待聘”；《毛诗》曰“经德”；《周礼》曰“求仁”；《戴礼》曰“服膺”；《春秋》曰“养正”；武学曰“讲艺”。（《高丽史·选举二》）

仁宗朝规范中央官学，规定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学习内容及其期限：“《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毛诗》、《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必令兼通。诸学生课业，《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公羊》、《穀梁传》各限二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传》各三年。皆先读《孝经》、《论语》，次读诸经。”并建立地方官学教授经典，“诏诸州立学，以广教道”（《高丽史·选举二》）。朝鲜中央官学最高机构为成均馆，其次为东西南中四学。朝鲜也普遍实行乡学乡校制度。各州府均设教授，各郡县均设训导（参见《经国大典·外官职》），各地俱有乡校，全国共计乡校 329 所，由此形成全国性的教育网络。其中儒学生徒名额每府、大都护府、牧各九十名，每都护府七十名，每县三十名。远高于医学、律学的每府、大都护府、牧各十四名，每都护府十二名，每县八名（参见《经国大典》卷一《吏典·外官职》）。

经筵讲经制度方面，高丽睿宗“置清燕、宝文两阁，入与文臣讲

论《六经》”。朝鲜也由熟谙中国经籍的大臣和专设官员为国王讲解经书。经筵为正三品衙署，掌讲读论思之任，主官三员称领事，由一品议政（宰相）兼任。属下设知事三员、同知事三员、参赞官七员、侍讲官、侍读官、检讨官、司经、说经、典经。“英庙设集贤殿，拣文士有名者兼带经筵，引接讲论，凡文翰之事悉委任之。早任晚罢，日官奏时，然后乃得出。光庙罢集贤殿称，兼艺文。成庙设弘文馆，以本官兼经筵，一日三接，讲论，从容问古今治乱。又夜对，有时三鼓而罢。当时盛事，至今传说。中庙以后纵虽不如成庙朝，几复成庙之盛矣。”（郑泰齐《菊堂排语》）

其次是私学教育背景。

以“海东孔子”著称的崔冲（984—1068）早在高丽显宗朝以后就重兴在战争中崩溃的教育，实施按九斋分科的私学教育。“凡私学，文宗朝大师中书令崔冲收召后进，敦诲不倦。青衿白布，填溢门巷。遂分九斋，曰：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谓之侍中崔公徒。衣冠子弟凡应举者，必先肄徒中而学焉。每岁暑月借僧房结夏课，择徒中及第、学优才赡而未官者为教导，其学则《九经》、《三史》也。间或先进来过，乃刻烛赋诗，榜其次第，呼名而入，仍设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进退有仪，长幼有序，竟日酬唱，观者莫不嘉叹。自后凡赴学者，亦皆隶名九斋籍中，谓之‘文宪公徒’。”（《高丽史·选举二》）至文宗朝，私学声誉甚至凌驾国学之上，发展迅速。除崔冲的“文宪公徒”以外，当时还有“儒臣十一家徒”，和“文宪公徒”并称“十二徒”。但其中以“文宪公徒”最繁荣。据《高丽史·崔冲传》载“十一徒”如下：弘文公徒（侍中郑倍杰，一称熊川徒）、匡宪公徒（参政卢旦）、南山徒（祭酒金尚宾）、西园徒（朴射金无滞）、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慎公徒（平章金义珍，一云郎中朴明保）、贞敬公徒（平章黄莹）、忠平公徒（柳监）、贞宪公徒（侍中文正）、徐侍郎徒（徐硕）、龟山徒（未知为何人）。此“十二徒”至恭让王三年（1391）才随高丽灭亡而结束。此期间所有名士几乎都是“十二徒”出身。其中不乏李资玄、郭舆等著名诗人。朝鲜王朝私学更为发达，至高宗时私学书院已达 650 所。

再次是社会的好学风尚和理学之昌明。

科举制度的激励和官学私学的教育，在韩国社会形成了普遍好学的良好风尚。“好学为荣，风俗已成。”（河演《四教堂记》）“我国家崇儒重道，建学立师，虽穷陬僻邑，莫不皆然。”（徐居正《全州乡校记》）“其俗上文，其子弟免父母之怀即游乡校。至于穷闾委巷，鱼鱼于于皆读书人。”（洪达贵《重修乡校记》）程朱理学自高丽末传入，至朝鲜明宗、宣祖朝达到高峰，出现了人称“海东朱子”的大理学家李滉（退溪）及与之号为联璧的理学家李珥（栗谷）。他们著书立说，建立儒学教育机构，对中国经籍的研究普及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理学的昌明，导致出现了以二李为首的一批理学家诗人徐敬德、宋翼弼、曹植等。他们自觉地将儒学精神带入诗歌创作中，也是韩国汉诗引经频数的因素之一。如徐敬德《赠葆真庵》：“主敬功成方对越，满窗风月自悠然。”主敬本《礼记·曲礼上》：“《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郑玄笺：“礼主敬。”对越本《诗经·周颂·清庙》“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句。李珥《求退有感》：“茅屋石田还旧业，半生心事不忧贫。”本《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诗人自身主观原因。

韩国诗人绝大多数是文科及第的朝廷官员，他们个个熟稔经典，都用过苦功。“判官孙必大号木谷，又号岁寒，湖西人，能文章。官不达，尝读《尚书》七千遍。”（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曹长渊臣俊字公著，号无闷翁，松都人也。读《书经》三千遍犹未了然，乃读《尧典》数万遍，《书经》旨义首尾始洞豁于心目。登第，累典州郡，以寿加秩绯玉。其诗……极有佳致。”（任埴《水村漫录》）“古今绩学之士靡不以勤致之，我东文章钜公多读书者亦可历数。……尹洁读《孟子》千周。卢苏斋读《论语》二千回。林白湖读《中庸》八百遍。……车沧州读《周易》五百遍。”（郑弘溟《畸翁漫笔》）“沙溪每于马上看书或诵读《庸》、《学》等书，无时不然。……常自言‘吾于《庸》、《学》诵读，殆过数千遍’。”（同上）在朝廷中，诗人们争相以经学通贯为尚，

甚至意气相争。“一日王幸国子监，命富弼讲《易》，命彦颐问难。彦颐颇精于《易》，辨问纵横，富弼难于应答，汗流被面。及彦颐为幕下，富弼奏彦颐与郑知常深相结纳，罪不可赦，于是贬梁州防御。”（《高丽史》卷九六《列传第九·尹彦颐》）甚至游戏之中亦以熟谙于经籍为胜。“昔年诸名官会，酒席座中曰：‘酒不可无令。’则出令曰：‘以《诗经》一句，继以五绝一只，终之以药名。而以《诗经》之韵同于药名之末字，然后可用。’又以迟速巧拙判胜负，负者不许酒。林沧溪咏曰：‘羊羔之皮，经岁又经年，陈皮。’赵副学持谦曰：‘野有蔓草，先遣小姑尝，甘草。’申平川曰：‘习习谷风，日暮掩柴扉，防风。’吴尚书道一曰：‘之子于归，山中酒应熟，当归。’韩执议恭东曰：‘他山之石，江南雨初歇，滑石。’朴参议恭逊曰：‘山有葛，白日来照之，干葛。’一若宿构者然。后余与尹尚书宪柱同往北关，语此事，尹始闻为奇，即继曰：‘何草不黄，八月边风高，大黄。’座中服其神速。且时当八月，地又六镇，即景为句，尤着题矣。”（具树勋《二旬录》）

另外，在韩国诗学理论中，以诗歌为教化工具，正人心，纠风俗的“诗言志”派占压倒的优势。“《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记》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此周《诗三百篇》宗旨也。韩子曰：‘诗正而葩。’朱子取之，此诗之体格也。反是而志尚颇僻流荡，词意粗浊险怪，皆诗之外道也。今当以《三百篇》为宗主，熟读而讽咏之，此诗学之本也。”（李植《学诗准的》）教化之源自然是经典。

在创作实践上，他们还以杜甫为榜样，主动以经书语入诗。“杜诗：‘自天题处湿，当夏着来清。’‘自天’、‘当夏’等字自经传中来，诗中使经传中字，古有其法。仆《赠鱼学官叔权》诗曰：‘诗坛我屈奔而殿，酒社君尊酌则先。’此所谓学步邯郸者也。”（权应仁《松溪漫录》）

“古人诗多用经书语。李师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岁云暮矣天无晴。’牧隐云：‘月独有情从我蔡，山多不俗起予商。’‘木铎何患二三子，舞雩六七咏归童。’‘王风幸矣兴于鲁，女乐胡然至自齐？’用辞不窘，工致可尚。”（徐居正《东人诗话》）

由于韩国古代科举与士子的仕途利益攸关，经书学习的程度深浅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因此激发了人们学习中国经学典籍的热情，

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辅之以普遍的乡学设立和私学教育，自幼发蒙的是经籍，简练揣摩以应考试的是经籍，经籍已经融贯在韩国诗人的思想深处。再加之诗学教化论的理论指导，与诗人有意引用经典的自觉创作意识，发之为诗，手到笔随的必然少不了引经据典，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九江学院图书馆



1455717